

一把剪刀做军鞋

姚香

在山西博物院，收藏着一把剪刀，与众多厚重的文物相比，它似乎很普通，殊不知，它是多么与众不同。原来，这是寿阳县共产党员尹灵芝抗战时期做军鞋用过的工具。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广大女性同胞以特有的坚韧和勇气，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她们虽为女儿身，却巾帼不让须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族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山西这片黄土高原上，有一株傲雪红梅，光彩夺目，她就是党的优秀女儿、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尹灵芝。

尹灵芝出生在山西省寿阳县的赵家垴村，父亲尹尔恭担任村抗联主任，进行抗日活动时，父亲就叫年幼的尹灵芝到门口放哨。会后她还跟着父亲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信仰的种子，在尹灵芝的心中植根、发芽。

尹灵芝先后担任儿童团团长和村妇救会副主任，因表现突出，16岁就破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尹灵芝动员妇女武装起来，她们以剪刀、锄头、棍棒为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无论环境怎样残酷，敌人怎样“扫荡”，根据地妇女们都不屈不挠，化苦难为激情，一边唱着《做军鞋》，一边紧张地缝制衣服、鞋袜和被褥。平凡的她们用不平凡的壮举，印证了革命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尹灵芝做军鞋用过的锥子、剪刀，看似平淡无奇，却见证着尹灵芝的革命精神。

1947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疯狂反扑，他们到处抢粮。尹灵芝发动妇女，配合全村的劳力，进行抢收，秋收斗争取得胜利。为了保护公粮和群众转移，尹灵芝不幸被捕。穷凶极恶的敌人对她的施以各种酷刑，在严刑拷打下，尹灵芝右眼失明，左腿骨折，遍体鳞伤，但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

1947年11月3日，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16岁的共产党员尹灵芝英勇牺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尹灵芝“刘胡兰式的革命烈士”荣誉称号。烈士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进。

山西博物院供稿



红色收藏

华美富丽的“剔红”

王国良



元末明初剔红花卉纹大盘

样逐渐加深；到了明清以后，剔得就比深了。

鉴别剔红真伪的主要方法有三种：一看包浆。一件剔红器作旧的手法无论多么高明，漆皮入手的感觉绝对不同，真品即使保养再好，几百上千年的空气氧化以及烟熏火燎依然会在表面留下一层包浆；而用草酸做出的包浆触手轻滑浮躁，放大镜下观察甚至能看到鲜艳的红漆。二看底胎。时下伪剔红绝大部分使用聚酯乙烯之类塑料为胎，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三看款识。事实上，绝大部分剔红都无款，包括清宫造办处“油漆作”真品。有款识的分两类：明代宣德年以前是在剔红器底部用针划出款识，这叫“针划款”；宣德之后采用刀刻楷书年号，然后填金，叫“填金款”。

早期的剔红，也就是宋元时期，剔红纹样都比较浅；元末明初的风格，纹

样逐渐加深；到了明清以后，剔得就比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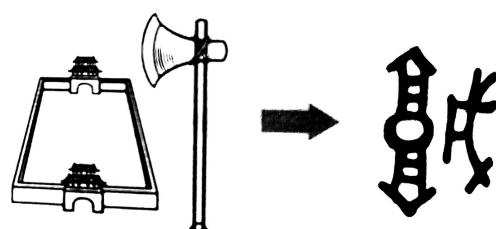
鉴别剔红真伪的主要方法有三

城

城

城

城



城墙是城的筋骨，城府是人的城墙

“城”，会意兼形声字，本义是城墙。甲骨文的“城”，字形的左半边是两个城楼相对而立的样子，右半边是一把利刃朝左的斧头形状，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用斧刃这种武器来守卫城池。古代的城邑，四周都建有用于防御的高墙。在现代汉

语中，“城”常用来指城市、都市。此外，有成语“胸无城府”，这里的“城府”，比喻的是难以揣测的深远用心。

《说画汉字》编辑部



说画汉字

钟楼街兴业钱局借据

史志刚

钟楼街有一座神秘的建筑120号院，民国年间，它曾是兴业钱局太原分号所在地。我收藏了两份兴业钱局的借据。

一张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兴业钱局担保农业合作放款借据（第一号），一张是民国元年（1912），绛州复德魁向兴业钱局前身兴业银行借三百两银的借据。

兴业钱局由官办的河东兴业银行改组而来，1914年设分号于太原。钟楼街兴业钱局经理为鲁文轩，山西洪洞人，曾任清末晋泰官钱局领事。兴业钱局所见实物不多，因而，这件早期兴业钱局前身兴业银行的借据也很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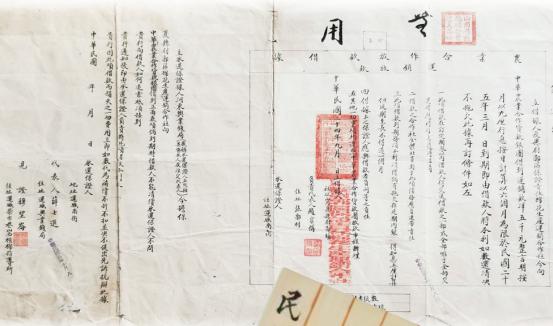
1916年，地方各界请求将河东兴业银行改由商办。山西清算了银行资金，召开了银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将“河东兴业银行”正式改名为“河东兴业钱局”，资本为30万元，钱局规模当时在全省首屈一指。改组后的兴业钱局聘请崔长庚为总经理。一年后，晋北的多家票号纷纷倒闭，一些著名的票号也改组为银行，但资产都不敌兴业钱局。与此同时，兴业钱局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如在安邑（今夏县）县城设立兴业当铺，在平遥、洪洞、天津设立分局，在西安、上海设立办事处。随着业务不断扩展，钱局年年赢利。

1929年，另一位管理兴业钱局的经理赵子敬上任了，他是一位有着极高天赋的金融家。

赵子敬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力扶持民族工业。当时，新绛县的股份制企业“大益成纺织有限公司”的股东想扩大生产规模，却因资金不足而一筹莫展。赵子敬得知此事后，一次向“大益成纺织公司”投资10万元，并不断为其提供流动资金。后来这家公司成为晋南最大的纺织企业。随后，赵子敬又向“荣昌火柴厂”放贷5万元，并投资开办太原印刷厂，入股晋华纱厂、太原灯泡厂等。1935年又在西安开设了兴业盐店。

1938年，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赵子敬遣散了职员，把兴业钱局的账册转到西安，自己则寄居在西安的兴业盐店里。这一住就是8年。因为兴业钱局属山西商号，在西安无法注册，于是只得在兴业盐店开展地下交易。抗战胜利后，赵子敬带人赶回运城，试图重新起步，但无奈运城战事连连，只好再次撤到西安。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钱局人员将仅存的账簿遗失。至此，兴业钱局走向终结。

1951年，运城专署组织专人对兴业钱局的资产进行清算。兴业钱局在南街的旧址为当时



↑兴业钱局担保农业合作放款借据（第一号）



→绛州复德魁向兴业钱局前身兴业银行借三百两银的借据

运城县公安局的办公地点。1998年，盐湖区财政局在这里建起了两幢白楼。

由兴业钱局几十年的起起伏伏可见，和平、稳定的环境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前提。

浑源牺尊

文慧



1923年3月，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在地里干农活时，偶然发现了绿锈斑斑的青铜器。很快，挖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争相将这块地翻了个底朝天，县长谢恩承得知此事后，没收了包括牺尊在内的36件青铜器。而此时，法国古董商人卢涅克在中国收购的20多件青铜器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首次展出，引起了巨大轰动，西方人惊叹：“这是能看到的第一批完整的中国出土物！”

36件被没收的青铜器，辗转于县衙、乡绅和军阀之间，直到1932年被旅法古董商人卢芹斋全部买走，从此远离家乡。1948年，有17箱货物抵达上海的江海关，准备以“仿古品”的名义，通过美国轮渡运往纽约。经过检查，342件货物中有339件都是真文物，其中12件竟然是中国青铜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浑源彝器”。正因此拦截，使这批国宝免遭流失海外的命运，而其他的“浑源彝器”则流散于世界各地，令人唏嘘。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国家一级文物、浑源彝器的代表作“牺尊”时，会感叹它穿越数千年仍熠熠生辉的艺术魅力。牺尊高33.7cm、长58.7cm，重10.76千克，整体呈牛形。它充满张力的双角，引人注目的鼻环，说明至少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为研究我国农耕文化和牲畜驯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更有趣的是，牛背上的小孔还架有铜制器皿，可以盛酒，前后两孔注入热水装在牛肚子里就可以温酒。这种独特的构造在我国青铜史上较为罕见，突出了牺尊作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实用性，

更将牛与酒文化的内涵结合得巧妙浑然。

牺尊的颈部和锅形器上还浮雕有写实的老虎、犀牛、大象等动物，头、颈、身、腿等部位装饰了大量的饕餮衔凤纹。这种花纹的陶范残片在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中也屡有发现，有着典型的晋国青铜器风格，代表了当时印模技术的高超水平。

牺尊的纹饰告诉我们它的来处，牺尊的器型诉说着它的归途，它彰显着典雅的中国气派。它是幸运的，绝处逢生、历尽劫波，最终留在了中华大地；它辗转颠沛的每一段路，都与旧中国那一段坎坷的历史密不可分。在有关牺尊的记忆中，低吟着历史的回响；在流散文物的故事里，呼唤着文保的力量；在一件件流失文物归国的路途中，感召着每一位国人共筑保护文物的铜墙铁壁。

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供稿

牺尊的颈部和锅形器上还浮雕有写实的老虎、犀牛、大象等动物，头、颈、身、腿等部位装饰了大量的饕餮衔凤纹。这种花纹的陶范残片在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中也屡有发现，有着典型的晋国青铜器风格，代表了当时印模技术的高超水平。

牺尊的纹饰告诉我们它的来处，牺尊的器型

笔架赏析

梁青

笔架，在中国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具有多样化的性格，总体来说，南北朝随意豁达、唐代雍容华贵、宋元端庄规矩、明清精雕细琢、民国自由奔放。

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不过从文献来看，当为山形，以木为主。

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此时



唐白玉雕龙形笔架

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唐诗中已有很多对于笔架材质或用法的描写。

宋代笔架以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



宋巧色红芙蓉玉兰笔架

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

元代的笔架崇尚宋人的山峰式。



元水晶山峰笔架

明代笔架造型较之前代更加多样，不再拘泥于山峰式，造型多变，材质也十分丰富，有玉石、瓷、犀角、木雕、金属等。



明铜龙纹笔架

清代笔架更胜明代，材质有玉、紫砂、水晶、铜、木、玳瑁、象牙等，以自然之物最为名贵。



清紫砂干枝梅笔架

及至民国时期，笔架风渐浓，渐渐带上了“西风”的味道。民国的笔架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品格和风骨。



民国素三彩海浪纹笔架

一枚钱“凿”成两个花

叶伟奇

我们常用“一个钱掰成两个花”来形容一个人穷困、节俭或者“抠门”。这里说的“一个钱掰成两个花”，不是真把钱掰成两个，因为一个真钱如掰成两个，那也花不出来了。但在用铜钱作为流通货币的古代社会，还真有将一个钱凿成两个，而且还能花得出去的。

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货币流通最为混乱的时期。其时战事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物价踊贵，货币贬值；官铸货币越铸越小，制作粗糙。民间私铸随之而起，将两汉时期的足值五铢钱进行剪凿，将一枚钱凿成两枚使用，与官铸小钱混合流通，这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货币流通的一大“特色”。

从货币产生时起就有货币私铸现象出现。但早期多从钱币边缘磨铜取熔，即将钱币磨去外廓、边缘，盗取铜材，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一般情况下，磨边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后来出现剪凿钱，将一枚钱剪成或凿成内外两枚使用。

剪凿钱，包括剪边钱和綫（音延）环钱两类，实际上就是将一枚钱一分为二。剪边五铢就是被剪凿了外廓或冲凿了外廓的钱，亦称“鑿边五铢”或“剪轮五铢”。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剪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平整，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钱的直径一般不足2厘米，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

綫环五铢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肉的五铢钱，钱币仅剩边缘，呈圆环状，还残存有小部分“五铢”钱文。一般多用利刃圆錾切割，将钱一分为二，内为剪边五铢，外即为綫环钱。通过对存世綫环钱上残余钱文分析，綫环钱多以东汉中晚期五铢鑿切而成，故其出现时间大体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初。大量出土实物表明，与东汉五



铢、剪边五铢同时出土的綫环钱数量甚少，比例极低。钱币研究者推断：鑿取綫环同磨边取屑一样，主要目的在于盗取铜材，用作回炉重新铸钱，而非为流通使用，故传世綫环钱较少。

过去一般认为，剪凿钱是用一种圆形锐器所凿。但通过对出土实物分析，凿边的工具并非仅限于圆形凿，许多是用指甲形凿所为，还有极个别的则是用近乎方形的凿凿成的。有人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綫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